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老上海的教堂

朱争平

富于历史厚重感和沧桑感的老上海教堂，是西方文化在上海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异国建筑风格和宗教文化的充分体现，而且也是我们了解海派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16世纪，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上海。徐光启对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640年其子孙助建于梧桐路137号的敬一堂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堂。这座庙宇式的西式教堂是天主教在上海扎根的标志。上海开埠初期，外国宣教士大多在本国领事馆中兼任职务，因而出现了天主堂与领事馆共处一地的特殊现象。19世纪中后叶，随着上海逐渐成为宣教的重镇，进入上海的西方各差会纷纷兴建教会建筑。至19世纪末，上海共有大小教堂300余所。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位于江西路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老北门第一浸会堂、苏州河以北最早的教堂救主堂，南苏州路的天安堂，北京西路的圣彼得堂，虹桥石皮弄的天恩堂，上海租界最早的教堂洋泾浜天主堂，董家渡天主堂，徐家汇天主堂（圣·依纳爵堂）等。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租界的进一步扩大，上海城市中心区域迅速扩展。至1920年，上海已有马路370余条，里坊2130余处，学校500余所，旅馆30余家，银行钱庄230余家，医院60余所，工厂500余家，影戏院30余家，近代上海城市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一个迅猛发展时期，为教会建筑的建造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教堂经历了模仿西式教堂的移植期，开始形成与上海狭小的城市用地相适应的海派西式教堂建筑样式。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等各种类型、各等规模的教会建筑拔地而起，出现了上海教堂建筑艺术的高峰。20世纪初的30多年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建造的教会建筑比整个19世纪建造的还要多。教会建造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初期建造的简陋建筑进行翻新、改建、扩建；二是为一批早期成立却没有独立建筑的教会机构建造新建筑；三是建造新创办机构的教会建筑。徐家汇天主堂经过扩建后可容纳近3000人同时礼拜，成为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老北门第一浸会堂也将老堂拆除进行了重建。同时，国际礼拜堂、景林堂、诸圣堂、鸿德堂、慕尔堂、沐恩堂、新福音堂等一大批教堂新建而成。1937年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上海的教堂建筑活动几乎全部停止。

造型别致、风格迥异的老上海教堂，是当时世界建筑设计潮流、审美取向、工程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妙结合。巴洛克式风格、浮雕中西杂糅的董家渡天主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尖拱门窗楹、铅条彩色圣像玻璃窗的徐家汇天主堂，融希腊、罗马、哥特式建筑艺术于一炉、中西合璧的佘山天主教堂，造型挺拔秀丽，墙面用红砖砌筑，俗称“红礼拜堂”的圣三一教堂，捷克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哥特复兴式建筑慕尔堂，带有西亚古朴的拜占庭风格的息焉公墓堂等都是老上海著名的教堂建筑。

教堂，使上海城市建设迈入西化的历程。最初上海县城的建设，基本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方式建造。开埠后，各国开始在租界建造各种类型的西式建筑，特别是各具风格和特色的教堂，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建筑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城市格局和空间上西化着这个城市，改变着人们对城市空间中心的认知。圣三一教堂高高耸立的塔楼，徐家汇天主堂哥特式双尖顶，苏州河畔新天安堂的钟塔等，打破了旧城肌理，以一种绝对强势的视觉语言出现，并占据着城市至高点，成为当时上海城市新的地标。随着教堂和教堂区的建设，近代教育模式和教会学校、现代医疗护理机构和教会医院、期刊社、印书馆、博物馆、天文台、育婴堂、孤儿院等现代文明也都逐渐进入上海，使这座传统城市开始变为一个带有较多西方近代城市性质的新兴城市。

上海解放后，在战争中毁坏的教堂得到修复，基督教、天主教走上了自立、自传、自养的道路。十年动乱中，教堂遭到浩劫。改革开放后，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得到恢复，被占用的教堂得以归还，遭破坏的部分教堂得以修复。

老上海的教堂，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载体，是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见证。如何对待这些遗产，充分运用其具有的宗教、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则是需要我们今天加以重视的问题。

春风得意　韩　敏

湄洲岛那一抹红色

傅　震

去厦门开会，有一天安排自由活动。香港公司的陈总邀请大家去他老家莆田观光。据他说，如果天气好，还可渡海去湄洲岛，拜谒妈祖祖庙。我心里顿时向往起来。

湄洲岛，一个离莆田不远的海岛，二十分钟的船程。船上的女导游介绍，岛上人口四万多，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这位年轻的少妇告诉我们，她从小生活贫困。男人们出海打鱼，女人在家带孩子，烧饭。烧饭，其实是煮粥，一日三餐都喝粥。男人们归航了，才有鱼饭吃。所谓鱼饭，就是把鱼铺在饭上一起煮。等饭好了，鱼亦熟透，鲜味渗透进每一颗米粒，比起广东等地的腊味饭，别有一番风味，决不输赛的。

船在湄洲岛的北角靠岸。上了岸，岛风拂面，很是爽人。一抹红色撩人眼球，红衣红裤，头戴红花的妇女们，推着自行车围上来。后车架上驮着草蒲窝，“茯苓糕，茯苓糕。”揭开窝盖，热气混着香气扑向你，令人难以拒绝。她们一直笑着，长期被海风亲吻的脸，红得似花一样。荡漾的笑意把玉脂般的茯苓糕递到每个人手上。

女导游带我们坐电瓶车，从岛北直奔岛南的鹅尾神石风景区。贯岛而行，饱览湄洲岛域光风情。这里是大自然的天地，海风任意地奔放，棕榈婆娑；海浪纵情地拍岸，湄屿潮音。最是那迎风怒放的木棉花，根本无需绿叶的呵护，净身惬意地在风中摇曳。血红血红的花瓣，直直地伸向太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花能像木棉花如此阳刚。倾射的阳光，把木棉花的红色宣泄得如此畅丽。花红和阳光无间地呼应着，和田园滩涂上红色的衣裙呼应着。

导游告诉我们，红色是湄洲岛的流行风俗，农历每个月的初二、十六，女人们都得穿红衣裤，其实，她们几乎天天穿，因为她们喜欢。红色是阳光，是生机，是希望，是阳刚的男人。姑娘穿红色，希望能嫁个勇敢刚强的男子汉。少妇穿红色，希望能多生胖小子，岛上甚至有这样的风俗，男女双方直到养出男孩，才正式举办婚礼。年纪轻轻的导游说，她十八岁出嫁，女儿都十四了，老二是儿子。再过四年就可做外婆了，要抱外孙子啰，说着说着，满脸欣喜。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穿红色，那更有讲究，那红色代表她的老伴还健在着呢。我翻然醒悟，一个靠搏斗风浪谋生的族群，男人是何等的重要。一个少年，十五六岁，出海捕鱼，操舵扬网，掀风踏浪，出生入死几十年。临了，还能和牵挂了他几十年的那颗心白头偕老，共度往生。这是何等刻骨铭心的生命赞歌。能穿上红衣裤，那是老翁老太们的生命造化，穿是必须的。这红色已经难以用吉祥幸运来诠释。老奶奶的红衣裤，印记着多少人间悲欢，蕴藏着多少人生尊傲，揭示着多少天地道理，关照着多少后生警训。在湄洲岛，红色已成一个大写的阳刚人字。

然而，就在这阳刚独尊，男人至上的岛上，竟然诞生了一位光普世界的女神——妈祖。世代搏击风浪，战海妖斗水鬼的彪悍男人们，居然让一个柔弱女子作护佑神，这件事本身就够惊天地泣鬼神的了。我们是自觉遵循阴阳之道的民族。风浪中拼搏生存，不仅需要刚毅的力量，更需要有把握天地的智慧，世界需要阳刚，也需要柔软。

源出虞山：广陵派与梅庵派

——琴的江湖之五

钟　菡

广陵派发源于江苏扬州，与同出于江苏的虞山派渊源很大，按照清代吴中琴家蒋文勋说法，“吴派后分为二，曰虞山、曰广陵”，视二者为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吴派”大约就是隋唐琴师赵耶利所谓的“吴声”，他曾说，“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概括了其琴风特点。但广陵派形成比虞山派要晚许多，其首创者为清初的徐常遇，据说其琴风也是近于虞山派的。民国时期又有孙绍陶等人成立了“广陵琴社”，继承发扬了广陵派的琴学，在当时亦颇有影响力。不过，广陵派琴风发展到现在，已与虞山派区别较大。

广陵派的形成与清代扬州成为漕运要道不无关系，交通发达带来经济文化的繁荣，不仅是琴，书画方面也有“扬州八怪”之称的名家活跃。广陵琴家对于古谱的修订和整理颇为重视，在此方面成就显著，现在常见的《五知斋琴谱》《蕉庵琴谱》等都出自广陵。不过广陵派是不弹《广陵散》的，《广陵散》琴声“愤怒燥急”，讲究“清、微、淡、远”的虞山派不喜，与之相近的广陵派大约也不会喜欢。按照耶律楚材的说法，擅长“燥急”蜀声的苗秀实能将这曲子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而现今的《广陵散》则算是九嶷派的代表作了。

梅庵派的祖师王燕卿与九嶷派祖师杨时百是同时期人，梅庵派的创立时间与九嶷派相比大约同时稍晚，也是现在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梅庵派与琴人辈出的山东“诸城王氏”渊源深厚，据说梅庵派祖师王燕卿就是学琴于诸城琴人，故又有观点认为梅庵派是诸城派的分支，然而以其琴风来看，又可说“其源出于‘虞山’”。

这里面其实颇为复杂。王燕卿是山东诸城人，原本是在济南、诸城一带传琴，其真正为时人所重却是在到南京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的琴师，这也是古琴进入现代学府的开始。“梅庵”为南京高师校园的一隅，因有六朝古松环绕，环境极为幽雅，被王燕卿选做授课的地点。他的学生徐立荪在民国十年结社时，为了纪念老师，就以“梅庵”命名，所集的谱也名《梅庵琴谱》。这本琴谱在现代古琴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好多流行曲目如《关山月》《玉楼春晓》《长门怨》都是传自此谱。

据说王燕卿原本学的是虞山派的琴，但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山东民乐的风味，这种风味在《秋风词》《关山月》等短曲中十分明显。梅庵派的《平沙落雁》也以其欢腾、热闹的特点与哀怨的南“平沙”形成鲜明对比。应该说，梅庵派琴风的形成是典型南北琴风融合的结果，其他各派其实也都是在当地琴风的基础上杂糅众长，而由于琴人的四处交游往来，某派在形成后，活动地区未必一直局限于某一地域。琴实在是跟着人走的，人到哪里，琴就传到哪里。据说现在梅庵派琴人的主要聚集地不在南京，也不在诸城，而在镇江、合肥等地。其他历史更为悠久的琴派，大概也难免这种情形。

江湖名号：广陵派
祖师：徐常遇
琴风：跌宕多变，绮丽细腻，刚柔相济，音韵并茂
名曲：《龙翔操》《梅花三弄》《岳阳三醉》等
名家：孙绍陶、张子谦、刘少椿等
秘籍：《五知斋琴谱》《自远堂琴谱》《蕉庵琴谱》《枯木禅琴谱》

江湖名号：梅庵派
祖师：王宾鲁（燕卿）
琴风：在虞山琴风基础上融合山东民乐特点，吟猱幅度较大
名曲：《长门怨》《关山月》《玉楼春晓》《平沙落雁》等
名家：王心葵、徐立荪、詹澄秋等
秘籍：《梅庵琴谱》

下一回：名谱传承浙兴派

夜光杯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安宁的晚上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傍晚显得这么安宁。微小的冷雨，空无一人的街道，樟树哗啦啦地摇动着叶子。我家厨房对面的阳台上能看到塞尔维亚领事馆飘扬的塞尔维亚国旗，它在夜风里摇曳，令人想起哈扎尔故事里那个捕梦的人，一路狂奔，赶去别人的梦里死掉。

怀念舒展老师

严建平

清明时节，想起几位已经离世的《夜光杯》老作者，其中就有舒展老师，我很怀念他。

与舒展老师相识是在晚报复刊以后，由时任中青报驻沪记者袁梦德兄介绍的（梦德也于前年遽然离世，令人不胜感伤）。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舒展老师五十年代曾在中青报编《辣椒》副刊，受到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表扬。但也因其辛辣而在1957年遭难。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了工作，并于1983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大地》副刊（后担任文艺部副主任），又重新开始写杂文。由于他年轻时学的是戏剧文学，所以文学功底深厚，且又富于形象思维，所以他的杂文既活泼，又有辣味。

舒展老师对晚报非常看重，是真正的“新民之友”。记得1985年初，他写过一篇《报春燕与“晚报热”》，他认为“晚报热”对办报人是有启发的，他作了一个归纳，晚报受欢迎的原因是：动作快，版面活，品种多，八股少，体积小，容量大。他还说：“晚报若无可读性，那是自杀政策。”以后晚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因为对《夜光杯》爱之深，所以有时候也会责之严。舒展老师总希望《夜光杯》的杂文辣味能更重些，为此常常会向我提意见或建议。1986年8月26日，《夜光杯》刊登了巴金老人的《“文革”博物馆》。舒展老师非常兴奋，马上来信响应，他开玩笑似地问我：“你们总编是不是换人了？”我当即回信告诉他，我们束纫秋总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他反“左”和否定“文革”是一以贯之坚定的。

舒展老师与钱锺书、杨绛先生很熟，深得二老的信任。但他与二老的交往从不见诸文字。他非常了解二老淡泊自甘的心思，可又想让读者了解二老的精神境界，所以就在不违拗二老意愿的前提下，打起了擦边球。1991年是杨绛先生八十诞辰，舒展老师将方成先生所作贺杨先生八十大寿的漫画寄给了我，并代我们拟了一段编者附记：“去年本报曾刊登方成同志为钱锺书先生贺寿画；今年适逢杨先生八十大寿，又收到这幅佳作。登不登呢？登吧，有违杨先生生日悄悄度过之雅意；不登吧，厚钱薄杨，显出男尊女卑旧观念，也冷淡了方成先生一片热忱，考虑再三，还是来个少数服从多数加上编者的专断，登出以飨读者。”

舒展老师编过一套《钱锺书论学文选》（五卷），获得了全国优秀图书奖，尽管他对钱先生的著作研究很深，但钱先生在世时，他几乎没写过一篇文章，直到钱先生去世后，为了纪念，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钱先生的论述，他才给《夜光杯》写了《读钱锺书札记》系列文章。

舒展老师一直心挂《夜光杯》，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想到的总是《夜光杯》，譬如《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的出版，杨绛先生向清华大学捐赠稿酬建立“助学奖”等，都是他及时来电告诉我的。

舒展老师晚年身体不好，换过肾，但他的精神一直是乐观的，他关心国内外大事，针砭时弊，作文说话还是辣味十足。他儿子娶了个俄罗斯媳妇，有了孙女阿琳娜，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这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了莫大的乐趣。说起阿琳娜，他总是掩饰不了内心的欢愉。

这就是舒展老师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既保持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辣味，又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

十日谈　清明的回忆

从学徒工到首届韬奋奖得主。请看明日本栏。